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五四时期卷

秦弓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五四时期卷

秦 弓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五四时期卷/秦弓著. 一天
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06-5185-8

I. 二… II. 秦… III. 翻译 - 文学史 - 中国 - 现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50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284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 | 001 |
| 一、翻译的价值 | 003 |
| 二、翻译的主体 | 013 |
| 三、翻译的选择 | 022 |
| 四、翻译的效应 | 040 |
| 第二章 泰戈尔热 | 043 |
| 一、泰戈尔热的景象 | 043 |
| 二、泰戈尔热的成因 | 051 |
| 三、泰戈尔热的矛盾 | 065 |
| 第三章 日本文学翻译 | 070 |
| 一、轨迹:从冷到热 | 071 |
| 二、热点:白桦派、厨川白村 | 082 |
| 三、眼力:着眼点与模糊点 | 101 |
| 第四章 易卜生热 | 120 |
| 一、译介与演出 | 121 |
| 二、认同与接受 | 132 |

略

目

| | |
|--------------------------|------------|
| 三、热中之冷 | 142 |
| 第五章 儿童文学翻译 | 151 |
| 一、安徒生童话翻译 | 152 |
| 二、其他儿童文学翻译 | 164 |
| 三、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 | 193 |
| 第六章 俄罗斯文学翻译 | 203 |
| 一、五四盛况及其原因 | 204 |
| 二、回首“黄金时代” | 212 |
| 三、紧追“白银时代” | 230 |
| 第七章 翻译方法 | 258 |
| 一、翻译的可能性与“重译”问题 | 259 |
| 二、直译 | 264 |
| 三、意译与神译 | 271 |
| 四、语体及其他 | 277 |
| 附录： | |
| 一、《国际歌》的中文翻译 | 286 |
| 二、《小说月报丛刊》中的译著目录 | 296 |
| 三、《文学周报丛刊》中的译著目录 | 299 |
| 四、《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的译著目录 | 301 |
| 五、《未名丛刊》中的译著目录 | 305 |
| 主要参考书目 | 307 |
| 后记 | 313 |

第一章 绪论

中国的翻译文学，早在《左传》、《国语》、《史记》、《说苑》、《汉书》、《后汉书》、《古今注》、《乐府诗集》等古典文献中就留有零星的记载。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内容，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孟兰盆经》、《华严经》等堪称佛教文学的代表作。近代以来，随着了解世界的需求逐渐增强，翻译成为一项规模宏大的事业，继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之后，翻译文学蔚为大观。

比起佛教文学来，近代翻译文学已有自觉的文学意识，把外国文学作为文学来翻译，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一些影响翻译文学质量及其发展的问题，譬如：以“意译”和译述为主，其中根据译者感情好恶、道德判断及审美习惯而取舍、增添、发挥、误译、改译、“中国化”（人名、地名、称谓、典故等中国化，小说译为章回体等）的现象相当严重；原著署名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不少译著不注明著者，或者有之但译名混乱，还有一些译著也不署译者名^①；译作中只有少数用白话翻译，大多数与代表性成

^① 参照郭廷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3-43页。

| 小 說 月 報 | | 第十三卷 第十二號 | |
|---------------|------|----------------|----|
|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發行 | | | |
| 一 | 短篇小說 | 蕭軍譯……… 魯迅(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二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三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四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五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六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七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八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一)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二)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三)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四)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五)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六)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七)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八)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九十九) | 曹湜 |
| | | 蕭軍譯……… 蕭軍(一百) | 曹湜 |

《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号目录

果则为文言;各种文体不平衡,小说居多,而诗歌、散文较少,话剧更是寥寥可数。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远承古代翻译的遗绪,近续近代翻译的脉络,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迈进了一个新纪元。译者队伍不断扩大,发表阵地星罗棋布,读者群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翻译文体渐趋丰富,白话翻译升帐挂帅,翻译批评相当活跃,翻译质量有了长足进步,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

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翻译文学常常受到冷落,即使纳入视野,也往往只是作为背景来看待。实际上,对于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文体范型与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的示范引导、现代文学语言的成熟,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翻译文学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译文学不仅仅是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而且从对象的选择到翻译的完成及成果的发表,从巨大的文学市场占有率到对创作、批评与接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都

作为走上前台的重要角色，直接参与了现代文学历史的构建和民族审美心理风尚的发展，对此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翻译的价值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侧重于物质文明建设的洋务运动、旨在制度文明改革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了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日程。在这一背景下，始于近代的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有了走向全面、深化的契机。

近代翻译文学已经使国人初步见识到新颖的外国文学样态及其所表现的异域风土人情，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尽管对新文学与翻译文学都提出了启蒙要求，但在一些人眼里，新文学尽可承担启蒙的重任，而翻译文学则只是为创造中国新文学所做的准备；文学创作是终极目标，而文学翻译则不过是权宜之计。这实际上轻视了翻译的价值。时在日本的郭沫若，正处于创作热情高涨期，加之年轻人的敏感，因为自己的创作在报上发表时被排在翻译的下面，便发出了“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的感慨。他认为，“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①十分看重翻译的郑振铎，在题为《处女与媒婆》的短文中，对这种带有一定倾向性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他们都把翻译的功用看差了。处女的应当尊重，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翻译的性质，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译的大功用却不在此。……就文学的本身看，一种文学作品产生了，介绍来了，不仅是文学的花园，又开了一朵花；乃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又多一个慰藉与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如果在现在没有世界通用的文字的时候，没有翻译的人，那末除了原地方的人以外，这种作品的和融的光明，就不能照临于别的地方了。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

^① 转引自郑振铎《处女与媒婆》，1921年6月1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号。

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稍后，他又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中指出：“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作家。他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①在1922年8月11日《文学旬刊》上的《杂谭》中，他再一次说：“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

郑振铎一再强调翻译文学对于精神建设的重要价值，这正体现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时代特征。这种见解并非郑振铎的个人看法，而是一班新文学先驱者的共识。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明确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他在主持《小说月报》全面革新一年之际，回顾说：“我们一年来的努力较偏在于翻译方面——就是介绍方面。时有读者来信，说我们‘蔑视创作’；他们重视创作的心理，我个人非常钦佩，然其对于文学作品功用的观察，则亦不敢苟同。”要追寻永久的人性，沟通人间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并非一人乃至一国作家所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②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③中，他再次强调：“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鲁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就是想借此唤醒彼此隔膜、无端仇视的国民；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而是觉得“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

① 1921年7月《改造》杂志。

② 《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1921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

③ 1922年8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5号。

话”。鲁迅想借此让“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肿痛,以便获得割治肿痛的“痛快”,防止“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①五四时期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译者视野、通过翻译而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就是因为其中表现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意蕴、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观念,正为新文化启蒙运动所急需。这类翻译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与现代启蒙中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8月12日《京报》“青年之友”里有一篇文章说,“凡是翻译的文学,只足供研究文学的人的研究资料而不能尽文学的真正任务——儿童文学尤其不是翻译的文学所能充当”。当月2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1号发表署名春的《儿童文学的翻译问题》,对此质疑道:“翻译不过是把文学作品的形式,变换一下,至于作品里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经过一度翻译之后,是决不会全然消失的;便是作品里的情调,风格,韵律,要是译得好,也往往能保存到八九分。那么翻译出来的东西,为什么

竟‘不能尽文学的真正任务’呢?难道神曲的英文译曲(本),深(浮)斯德的法文译本,罪与罚的德文译本,都只是‘研究文学的人的研究资料’,不能算为一种文学作品吗?”接着,作者以《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



《小说月报》封面

①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北京未名社1925年12月版。

《鲁滨逊漂流记》为例,说除了本民族能够阅读原本以外,全世界大多数儿童所读的都是译本,难道那些译本都不能成立吗?人类的思想感情有相通的地方,儿童尤其如此,儿童文学不应有国界的分别。中国的问题,不是翻译过多了,而是嫌少,所以,他呼吁“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文化前途”,应该多多翻译西洋童话。文章虽然是从儿童文学切入,但触及了对整个翻译文学功能的认识。在新文学先驱者看来,翻译文学可以作为创作的准备,也能够充当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与精神启蒙的工具,但其功能绝非仅仅如此而已;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具有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类普遍价值,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魅力。

较之近代翻译文学,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有了更多的文学自觉。沈雁冰把翻译视之为当下最关系新文学前途盛衰的一件事^①。关于翻译之于创作的功用,郑振铎多次说过不仅仅为“媒婆”而止。他在《翻译与创作》中将其比作哺乳的“奶娘”,还称之为开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总体来看,新文学先驱者认为从翻译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汲取营养滋补新文学。

一是文学观念。传统文学观念中载道教化占有重要地位,新文学先驱者意识到,要想完成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将载道之“道”由家族主义、奴性主义等封建伦理置换成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现代之“道”,改变视文学为高兴时的游戏与失意时的消遣的观念,把文学看作一项表现人生、关乎人生的重要事业,并且真正把文学作为文学来看待,把握其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必须大力译介外国文学理论。从古典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到苏俄新兴文艺观念,五四时期均有翻译,而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点大大超越了近代文学翻译。

二是文艺思潮。文艺思潮对于以往缺少文学史梳理的中国来说,本是一个陌生的概念,20世纪之初引进中国,五四时期渐渐为国人所熟悉起来。此时,远则文艺复兴,近则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思潮,纷纷译介进来。从文艺复兴体认外来影响对于文学发展的必要性与五四文学革

^① 《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

命的合理性，从西方近代文艺思潮汲取新文学的发展资源。胡愈之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①中指出：“翻译文艺，和本国文艺思潮的发展，关系最大，俄国近代的文学家，可算盛极一时了，但他们的起源，实是受德国浪漫文学，法国写实文学的影响。日本近年文艺思潮的勃兴，也是翻译西洋文学的功劳。所以翻译西洋重要的文艺作品，是现在的一件要事。二三十年来我国翻译西洋文学的成绩，是不必说起，但从今以后，我国的一般文艺翻译家，也该觉悟了。今后最要紧的，便是翻译近代写实主义的代表著作，因为新兴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和我国文艺思想，隔离尚远，惟有写实文学，可以救正从前形式文学，空想文学，‘非人’的文学的弊病。所以像曹拉（今译左拉——引者注）、莫泊三（今译莫泊桑）、斯德林堡、哈提（今译哈代）等的小说，易卜生、霍德曼（今译霍普特曼）、皮龙生（今译比昂逊）等的剧本，以及俄国名家的作品，都应该捡要紧的翻译。翻译的时候，须先懂得作者的身世派别，和他的特长，并且要用忠实细心的态度，不致埋没原作的长处。要是这样做去，真正的写实文学，才会得输入，我国文艺思潮的前途，才有一线的光明。”五四翻译对文艺思潮的重视，尤其是对写实主义情有独钟，于此可见一斑。但正如《〈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在肯定“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的同时，主张“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②，实际上，五四时期译介过来的文艺思潮相当丰富，举凡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潮都能看到，远非写实主义一种。

三是文体建设。新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传统无论情愿不情愿、自觉不自觉，都必然有所承传，而对于外国文学却是自觉地从语体到文体多有借鉴。这种借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五四文坛对此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胡适主张“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③。曾朴赞同“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④。郑振铎在《翻译与创作》中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

① 192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② 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③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④ 病夫《复胡适的信》，《真善美》第1卷第12号。

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再次强调指出：“就文学的本身讲，翻译家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的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的责任的，却是翻译家。”他举出威克立夫的《圣经》译本被称为“英国散文之父”，路德的《圣经》译文是德国近代文学的基础，俄国文学史上翻译事业对于俄语的形成乃至俄国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明翻译家对于本国文学建设是如何的重要。他在《俄国的诗歌》中，又拿几个以翻译著称的诗人——翻译贺拉斯全集的福依史、翻译席勒的美依、翻译席勒、歌德、莎士比亚、拜伦的格庇尔、翻译海涅的美克海洛夫、翻译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歌德、海涅的文保尔为例，充分肯定“灌输外国的文学入国中，使本国的文学，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①。沈雁冰也说，“若再就文学技术的主点而言，我又觉得当今之时，翻译的重要实不亚于创作。西洋人研究文学技术所得的成绩，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或者一定要采用。采用别人的方法——技巧——和徒事仿效不同。我们用了别人的方法，加上自己的想象情绪……，结果可得自己的好的创作。在这意义上看来，翻译就像是‘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②

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文学。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前驱者，大抵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有时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胡适的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堪称《尝试集》中最早成熟的作品与最出色的作品。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 Lin 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

① 1922年2月1日《民铎杂志》第3卷第2期。

② 《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

火柴的女儿》等。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译诗《老洛伯》时，加了一段较长的《引言》，指出“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此当日之白话诗也”，强调苏格兰白话文学对于英国文学革新发展的重要意义。胡适翻译此诗，一则缘于自身品尝婚姻苦果与此诗达成共鸣，再则就是从中寻找文学革命的动力。《引言》便能看出译者对翻译文学语体问题的自觉意识。饶有意味的是，这篇《引言》带有文言色彩，而后面的译文则是道地的白话，这种对比恰好可以证明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各种体裁与多样风格的翻译，五四时期亦有自觉的意识。小说翻译在近代已有相当的基础，五四时期主要是在对象选择的深广度(作品的经典性与风格的多样化等)与提高翻译质量上向前推进；也许与中国散文基础雄厚、传统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难度相对较小有关，散文的翻译较少。翻译界讨论较多的是诗歌与戏剧。沈雁冰的《译诗的一些意见》指出翻译外国诗的意义，在于“借此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①。朱湘的《说译诗》说得更为具体：“倘如我们能将西方的真诗介绍过来，使新诗人在感兴上节奏上得到鲜颖的刺激与暗示，并且可以拿来同祖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参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国旧诗中那一部分是芜蔓的，可以铲除避去，那一部分是菁华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诗中又有些什么为我国的诗所不曾走过的路，值得新诗的开辟。从意大利的裴特拉(Petrara)介绍希腊的诗到本国，酿成文艺复兴；英国的索雷伯爵(Earl of Surrey)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始创无韵诗体(Blank Verse)。可见译诗在一国的诗学复兴之上是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了。”越是陌生而难译的文体，越是着意提倡翻译。诗歌是这样，完全为舶来品的话剧更是如此。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同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的建议，宋春舫很快就选出全是话剧的《近世名戏百种目》，刊于同年10月的《新青年》。傅东华注意到中国不曾有过歌剧体裁的翻译，而“觉得中国将来应该有一种新体的韵文，但若从创作方面着手，总不

^① 1922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2号。

免仍要落入旧韵文的窠臼,因为创作者的思想是可伸缩的,既可伸缩,便往往不知不觉之间要拿自己的思想套在旧韵文的格律里面去。因此,我想当这种新体韵文未能确立根基之先,应该多翻译外国的韵文,以资练习。因为翻译的时候,你只得另创一种新的声调去凑合原文,决不能把原文改窜增损来凑合你的现成的声调。由是翻译得愈多,创出来的新声调也愈增加。将来便能使韵文也和寻常说话一样,可以运用自如,绝无拘束。”^①于是,他翻译了歌剧《参情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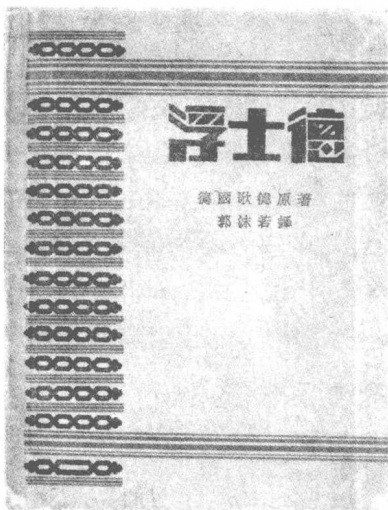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翻译与创作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文学先驱者每每把二者平等相待。郑振铎在1922年5月11日《文学旬刊》第37期新辟的“最近的出产”专栏上发表《本栏的旨趣和态度》,把“出产”的范围界定为:“所谓文艺的出产自然把本国产——创作文学——和外国产——翻译文学——都包括在内。我们把翻译看作和创作有同等的重要。”朱湘在《说译诗》中说,英国诗人班章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情歌》,无论哪一种英诗选本都选人,其实它不过是班氏自希腊诗中译出的一首;近世的费兹基洛译波斯诗人莪默迦亚谟的《茹贝雅忒》,在英国诗坛上广有影响,有许多英国诗选也都将它采录入集。他以此为例,指出:“由此可见译诗这种工作是含有多份的创作意味在内的。”^②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新诗社编辑部编辑、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1月初版的《新诗集》(第一编)里,就收有孙祖宏翻译的《穷人的怨恨》、沫若翻译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王统照翻译的《荫》。同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的第一部个人诗集——胡适的《尝试集》,也收入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哀希腊歌》、《墓门行》。1952年,胡适编选《尝试后集》时,仍然把白郎宁的《清晨的分别》、《你总有爱我的一天》、葛德的 Harfenspieler《别离》、《一枝箭,一只曲子》、薛莱的小诗、《月光里》、莪默(Omar Khyyam)诗、Michau 诗等译诗收入其中。赵景深诗集《乐园》也是著译兼有,收创作10首,译诗25首。周作人的散文集《谈龙集》收有译作《希腊神话引言》、《初夜权引言》,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

① 傅东华《参情梦·译者的话》,《小说月报》第16卷第10号,1925年10月。

② 《文学周报》第290期,1927年11月13日。

鳞爪》收有译作《鸱鸺与芙蓉雀》、《生命的报酬》。现代第一部创作小说集《沉沦》里，也收有歌德《迷娘的歌》的译文。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序一》中这样说明集子里收录三篇译文的理由：“我相信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因为真的翻译之制作动机应当完全由于译者与作者之共鸣，所以我就把译文也收入集中，不别列为附录了。”二三十年代影响较大的几套丛书，译著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小说月报丛刊》收译著 32 种，占 53.3%；《文学周报社丛书》收译著 12 种，占 42.9%；《文学研究会丛书》收译著 61 种，占 57%。由此可见，在新文学前驱者看来，翻译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对此予以认同，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 1933 年 9 月版）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年 6 月版）分别将翻译文学列为第七章与第八章，田禽《中国戏剧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4 年 11 月版）第八章为“三十年来戏剧翻译之比较”。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说：“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这句话道出了他将翻译文学纳入新文学史的原因，而实际上，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重要工作，并非止于新文学初创期，到三四十年代乃至整个 20 世纪都是如此。

翻译文学除了直接以翻译的身份出现之外，创作中也有摘译或改译，譬如：现代第一部散文集——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里，就有郭沫若译歌德《浮士德》诗句代序，还有郭沫若译雪莱诗《百灵鸟曲》，即《致云雀》。郁达夫在短篇小说《沉沦》里也引有作者自译的华兹华斯诗。喜爱摘录的周作人，其译介性的散文里有更多的译文，《希腊的小诗》里，有诗人西蒙尼台



△ 郭沫若译《浮士德》
创造社出版部 1928 年 2 月版

斯为三百个斯巴达战士所作的诗体墓志铭、柏拉图的小诗(“以前你是晨星,照过人间,现在死去,在死人中辉煌如长庚。”“我的星,你正在看星,我愿得/化身为天空,用许多的眼回看你。”)、萨普福(通译萨福)的诗铭与抒情诗片段(后者如:“正如甘棠在树顶上发红,/在树顶的顶上,所以采果的人忘记了;不,不是忘记,只是够不着。”)等20首;《日本的诗歌》里,既有小泉八云、芳贺矢一文章的摘译,更有香川景树、和泉式部、与谢野晶子、与谢野宽、田村黄昏、松尾芭蕉、服部岚雪、与谢芜村、正冈子规、小林一茶等人的诗歌24首;《日本的讽刺诗》里,征引译诗42首(其中一首是另一首的第二行)。至于大量外国作家评传、关于作家、作品、思潮的评论中的译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摘译或改译,已经成为创作与评论、评传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去掉,势必伤筋动骨折损元气。

由此看来,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具备了鲜明的启蒙时代色彩、视野广阔的世界眼光与独立而开阔的文学本体意识。这种深广的认识,不仅为新文学前驱者所引领,而且逐渐被文坛所认同。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梁启超,此时虽已不再处于翻译的前沿,但仍在推动翻译事业。1921年7月,他主编的《改造》杂志新辟“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发表梁启超《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为现代翻译文学提供历史知识资源。广大读者也对翻译寄予厚望。1920年3月22日《民国日报·觉悟》刊出上海海关藏书楼主任周恂枪的来信,表示愿意把他所管理的外国书籍杂志借给愿意翻译的人翻译。《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上刊出的广州读者陈静观来信,希望“多刊翻译名著,少登无味的创作”。他认为,中国文学“害了隔食病,同肺病;除了用猛烈的消化药,和换新鲜空气外,没有办法,消化药是什么?就是打破一切死章句,腐思想;新鲜空气是什么?就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样,“不久中国害肺病的文学者,同一般有文学欲的平民,也可以‘沉疴立起’了。”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翻译文学在五四时期蔚为大观。举凡五四时期重要的报刊,很少有 not 刊登翻译作品的。“译文”、“译丛”、“译述”、“名著”等五花八门的翻译栏目与各种重点推介的“专号”、“专辑”,成为报刊吸引读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新青年》创刊伊始,就注意译介外国文